

主编 潘钧

高等日语教育

ADVANCE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非外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 1 辑
2 0 1 8

高等日语教育

ADVANCE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主编 潘钧

第 1 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等日语教育. 第1辑 / 潘钧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4 (2018.7 重印)

ISBN 978-7-5135-9950-4

I. ①高… II. ①潘… III. ①日语—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H36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5262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戚 新
封面设计 郭 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950-4
定 价 3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9500001

高等日语教育

ADVANCE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第 1 辑

编审委员会

顾 问 修 刚 (天津外国语大学)
 徐一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周异夫 (吉林大学)

主 编 潘 钧 (北京大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于 飞 (大连外国语大学)
王轶群 (中国人民大学)
王晓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尹 松 (华东师范大学)
刘 玲 (北京师范大学)
孙海英 (北方工业大学)
李奇楠 (北京大学)
苏 鹰 (湖南大学)
赵彦志 (复旦大学)
赵 蓉 (清华大学)
徐爱红 (中山大学)
熊仁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薛 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助 理 赵 耀 (北京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杜红坡

责任编辑 戚 新

6905033

创刊词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一方面，随着国内日语教学与研究规模的扩大，不论教学还是语言本体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较之过去，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密切。两国学者常常面对相似或相近的课题，互相关注、借鉴甚而联手合作已成为日语界的常态。在此新形势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素养，积极展示研究成果，谋求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同时，也希望不拘囿于日语界，向更广阔的外语学界、汉语学界乃至语言学界同行学习，汲取有用营养，发出自己的声音。

鉴于此，我们决定出版学术辑刊《高等日语教育》，每辑约请学术界、特别是日语界以外的卓有成就的语言学者撰稿，同时也力争推出一两篇新人作品，呈现年轻新锐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作者主体仍为构成学界中坚力量的中青年学者。每辑将常设特约论文、日语教学研究、日语语言学研究、汉日对比研究和书刊评介等栏目。每辑收入十余篇有关日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论文，一般含有若干篇前沿性研究综述，但大多数还是刊载具体扎实、颇有新意的个案研究成果，特别欢迎理论性较强的论文加盟。

学术的提高与繁荣需要大家一起来鼎力相助。我们热切期盼以此为平台，实现与国内外语言学界同行的交流、互动与融通，同时热切希望和欢迎日语界同仁们的批评指正、惠赐大著，共同促进中国的日语教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为繁荣中国的日语教学研究事业贡献力量。

《高等日语教育》编委会

2018 年春

目 录

创刊词 编委会

· 特约论文 ·

超越拼音规则的汉字：跨语言文本共享的书写纽带

——日语等语言中训读汉字的启示 陈保亚 001

· 日语教学研究 ·

体现外语学习观发展的日语教材编写要点浅析

——21世纪之后国内部分日语教材的梳理 林 洪 008

近十年国内日语教育研究动向与展望（2006-2016） 朱桂荣 024

日语语音教学的实践及展望——理论、方法与成果 刘佳琦 043

· 日语语言学研究 ·

日语形容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以词法学和句法学为中心 周 彤 056

日语复合动词构词研究综述 史 曼 069

从人称敏感现象看日语体标记-te i-的非自知功能 杨文江 081

日语定语从句中的情态成分考察——以表推测的情态成分为对象 陈燕青 096

从“虚拟位移”的角度看日语表达静态空间距离的方式 郑若曦 109

现代日语汉字动词的自他性与使役表达——以二字词为中心 朱越琦 122

“显微镜”一词的形成及其中日语言文化交流（1646-1831） 徐克伟 137

· 汉日对比研究 ·

可互换的抽象名词系词句与抽象名词存在句——以汉日对比为例 黄毅燕 149

从日汉对比角度看「Nになる」句式 王轶群 165

· 书刊评介 ·

《日汉对比认知语言学——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分析》述评 吕雷宁 177

《位移表达的类型学》评介 姚艳玲 185

英文提要 193

编后记 199

超越拼音规则的汉字：跨语言文本共享的书写纽带

——日语等语言中训读汉字的启示*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陈保亚

提 要：汉字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意音文字，有其存在的理据。汉字的字形和字音联系宽泛，有超拼音规则（简称超音规）的性质，这有利于不同汉语方言的人甚至不同语言共享古今中外的汉字文本。日文中的汉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本共享使汉字文本得以迅速扩展，汉文化得以迅速积淀，由此极大地提升了汉文文势和汉语语势。汉字使汉字文化圈的实现有了书写纽带，由此维系了华夏文明。随着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汉字也是汉语国际化和跨语言文本共享的书写纽带。

关键词：书写纽带、语势、汉字文化圈

1. 缘起：看待汉字的汉语国际化视角

世界上所有自然形成的完整文字系统，都是意音文字，如汉字和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赫梯文字等。除了汉字，其他意音文字后来都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唯独汉字延续至今。梁启超、鲁迅等认为汉字繁难是教育不普及的原因，因而导致中国落后。鲁迅甚至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也都主张改革汉字。学习汉字难度大是事实，但是否导致中国落后则需要深思。

此前的汉字改革目的主要着眼于汉字的繁难。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汉字在不同方言区之间乃至不同语言之间强大的共享功能重新引起我们注意。共享是知识扩散、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汉字的存在有利于汉语国际化。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言关系字专题研究”（13AZD05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14ZBD102）。

作者简介：陈保亚，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语国际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汉语国际化首先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汉语国际化程度越高,用汉语交流、思维和记录的人越多,更有利于汉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汉语国际化也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需要计算劳动力的时间。中国的中学以上教育基本上都开设有英语必修课,中国人口众多,学英语的时间总汇起来数量惊人。如果汉语国际化程度足够的高,学英语的时间可以大幅度渐少。这些时间如果全面用于创造财富,其价值相当惊人。汉语国际化还有重要的学术创造价值。中国花大量的财力提升中国学生的英语,英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很多都会到英美地区发展并工作,他们在国外英语发表的学术成果将成为英美国家的学术成果,知识产权也列入英美国家。如果这些学术成果在中国用汉语发表,中国的学术创造力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回大幅度提升,这些成果在中国的开发又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财富。

由此看来,考虑汉字的功用不仅要考虑汉字繁难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汉语国际化问题。

2. 汉字超越拼音规则的性质

汉字也有语音,但和拼音文字记录语音的方式不同。拼音文字的字母和语音对应,有比较严格的拼音规则(音规)。拼音规则特别严格的代表文字是俄文字母系统,会俄语者只要掌握了几十个字母拼音规则,基本上能够拼出语言中的语素和词。汉字字形主要和语素对应,不同的字基本上是不同的语素,字音和字形之间并没有拼音文字那样严格的拼音规则。汉字中的形声字和读音有一定的关联,但也不像拼音文字那样严格,比如“羊、洋、揚、陽”读音相同,声旁并不一样。即使声旁相同,比如“各”所管辖的字,有“各、路、落、格、咯、客、恪、恪”等不同读音。

正是因为汉字的这种宽松的字音关系,汉字能够容纳多种方言甚至语言的字音。汉字具有超音规性质。在拼音文字中,如果群体之间读音差别不大,拼音字母系统还可以维持不变,形成统一文字系统下的方言变异。比如英国英语的work,元音不卷舌,美国英语work,元音要卷舌。如果群体之间读音差别太大,由于拼音规则的要求,就会有不同的拼写方法,形成不同的文字,比如英语thank(谢谢)和德语dank(谢谢)。这些不同的文字所书写的口语也被称为不同的语言。英语和德语是不同的语言。由于汉字的超音规性质,类似英语和德语的读音差异,甚至更大的差异,汉字字形并不改变,比如闽语的“茶”读te,老派西安话的“猪”读pfu,尽管读音和普通话差别很大,但汉字字形不变。汉字字形基本上不跟着读音变化走。

正是因为汉字有超音规性质,汉字能够直接记录不同方言中读音差异很大、读音规则错综复杂的语素,现代汉语人可以在不确定古代读音规则的情况下阅读古代文本。汉字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以训读的方式记录不同语言的语素。比如日语中的「山(やま)」「川(かわ)」「島(しま)」,这里的读音是日语读音,和汉字读音没有关系。汉字的超音规性质使不同方言区或语言区的人能够共享古今中外汉字文本。

3. 文本的共享与强大的文势

根据史书和考古材料，至少从商朝开始，中原一带有很多氏族部落，汉人和这些部落有深度接触。从有明确记录的材料看，秦始皇平定江南，汉武帝平南越，三国孙吴经营江东、江南，东晋时五胡乱华，都有大量汉族进入武夷山以东和秦岭以南。汉代扬雄《方言》的记录显示当时汉语方言或中国的语言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差异。汉族多次南下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方言，至今闽粤地区还有复杂的方言表现。很多汉语方言之间由于语音差异大，基本不能交流，但能共享汉字文本。自甲骨文以来，汉字记录了丰富的汉语文本，各方言区的人，只要学会了汉字，尤其是繁体字，就可以共享这些文本。任何汉语方言区的创新，一旦写入汉字文本，就可以在各方言区共享。不同方言区对汉语文本的贡献，使汉语文本积淀不断增加，形成强大的文本势力（简称文势）。汉字强大的共享功能是汉字文势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拼音文字对文势的贡献远远弱于汉字对文势的贡献。傣泰语言拼音文字的文势和汉字的文势可做一个很好的比较。傣泰语言构成一个语言群体，内部差异远远没有汉语方言差异大，但傣泰语言内部各支系各有自己的拼音文字，泰语有暹罗泰文，老挝语有澜沧泰文（老挝文），西双版纳傣语有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语有德宏傣文，等等。由于拼音文字的差异，文本之间不能共享，这使得每一种傣泰语言文本的数量都远远不及汉文本的数量。文本的数量通常体现在词汇量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约37万多词条。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的《秦汉词典》收词6万。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傣语词典》（德宏）约2.8万多词条。傣泰语言的文字产生较晚也是傣泰文本少于汉语文本的一个原因。不过，如果傣泰语言有共同的意音文字，各傣泰支系有更多的文本共享机会，傣泰语言的文本会增加很多，傣泰语言文字的文势也会提升很多。

梵文、古希腊文、古拉丁文都是产生很早的文字，由于拼音文字的差异，这些文字文本之间并不能直接共享，而必须通过翻译或学会对方的语言。如果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共同使用一种类似汉字的意音文字，其文势要大得多。欧盟各国如果有共同的意音文字，欧盟或许能够比较好地解决通用语问题。

4. 华夏文明、汉字文化圈和国际语

随着国际化和网络时代的出现。各种区域共同体开始出现。这些共同体由于缺少汉字这样的超音规文字，不能充分共享文本。可以说，汉字很早就把不同汉语方言区的文化整合成了一个共同体，这就是华夏共同体或华夏文明。

汉语地域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汉语和周边民族语言接触，形成汉族说的汉语方言，一种是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形成少数民族说的汉语方言。由于汉字文本在方言区共享机会很高，不同地域方言直接通过汉字文本展开接触的机会也很高，这使地域方言通过文本有

更多的机会向权威方言靠拢,汉语权威方言也不断向各地方言吸收词汇和语法成分。在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文白异读,是权威方言和地域方言频繁接触的重要证据。历史上汉语长安话、洛阳话、南京话、北京话都不同程度地充当过权威方言或通用语。汉语人口不断增多,汉字文本的共享不断增强,通用语不断扩散。这是华夏文明扩展的最基本方式。

汉字的共享功能也是汉字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拉丁文曾经像汉文一样作为通用语在欧洲流行,拉丁口语或俗拉丁语后来分化出很多方言,作为拼音文字的拉丁文缺乏超音规性质,无法应付这些方言的差异,于是书写这些不同方言的不同文字开始出现,不同的语言也开始形成,这就是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语言的形成过程。其实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比拉丁语族语言之间的差异小,但汉字并没有分化成不同的文字,汉字的超音规性质使汉字能够书写这些不同的方言。

即使是统治者的语言,也会在汉字强大的文势下融入汉语。清朝前期,满语曾被作为“国语”加以推行,以便用满语满文作为管理国家的语言工具。但是,汉字文本积淀比满文积淀要深厚得多,多民族国家管理的规则制度早已积淀在汉字文本中,满文创制时间晚,满语中并未积淀这样多地内容。教育、科技、医学、农业、贸易、政治、经济理论、诗学等在汉字文本中也有几千年的积淀。满人从汉字文本中获取的知识比汉人从满文中获取的知识要多得多。满人一旦学会汉文,就可以和中国各地方言区展开文本交流,甚至和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展开文本交流。因此,汉人学习和学会满语的人并不多,倒是满人开始大批学习汉语。满语推广未能实现。当然,说汉语的人口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汉语人口为什么越来越多?这本身和汉语强大的语势有一定的关系,而强大的语势又和汉字的文势有关系。

华夏共同体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很多汉族群体携带有少数民族遗传特征,其实很多汉族群体都是少数民族在强大的汉语语势影响下转用汉语而形成的。少数民族学会汉语和汉字以后,就进入了一个超级的图书馆和交流平台,汉语和汉字比他们的母语有更多的用场,他们的母语逐渐被汉语替换。

汉字强大的文势也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原因。比如早期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琉球人一旦学会了阅读汉字文本,就可以学到儒学、佛学、道家学说、医学、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知识,而这些国家的学者当时用汉文写成的文本,也丰富了汉字的文势,日语、朝鲜语、琉球语和越南语也借用了大量音读汉字和训读汉字,于是形成了一个跨境共享汉字文本的汉字文化圈。古代的汉字文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有较高的通用性,这是汉字文化圈的体现。比如,琉球国古籍《历代宝案》记载了古琉球国与周边国家来往文书,该书收录了1424年到1867年琉球国和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满刺加(马六甲王国)、苏门答腊、爪哇等国的外交贸易往来公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文本,这说明汉字书写的文本在这一带有较高的通用性。

汉字文本在东亚的通用作用就像拉丁文本在欧洲的通用作用。但汉字的共享功能更强大,

因为使用拉丁文本的条件是学会拉丁文读音，但由于汉字的超音规性质，汉语方言人或其他民族可以直接用母方言或母语阅读汉字文本，而不管汉字文本的权威读音或标准读音。古代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和琉球人可以直接用母语阅读汉字文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训读。训读的出现说明汉字文本可以脱离汉字音作为纯书面语使用，即文本为汉字，读音为本国语言。这是汉字超音规性质的极端表现。纵观世界强势语言如拉丁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都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为通用语使用，但前提是殖民地区的民族必须学会这些语言。还没有发现这些拼音文字被作为他国语言的训读来使用，也没有发现这些拼音文字文本曾经被作为其他国家的纯书面语使用。未学会这些语言就不能使用这些语言的文本。与此不同，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岛、越南等地的民族很多是在不会汉语的情况使用汉语文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汉语国际化应该充分考虑汉字的超音规性质和汉字在文本共享方面的优势。

目前朝鲜、韩国、越南在自己的语言中取消了汉字，日本也在日语中减少了汉字。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出现，在这些语言中恢复汉字有利于文本共享。历史上由于汉字背后强大的语势，大量借词留在了这些语言中，这是很难去掉的。

培根、笛卡尔等很多哲人都曾经考虑过世界性人造语言，以方便国际交流。后来欧美学者开始努力提倡一种国际语（interlingua）或国际辅助语（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并且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从国际语的发展历史看，国际语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于拼音文字中。比如，作为一种国际语，柴门霍夫（Zamenhof）的世界语（Esperanto）算是最成功的国际语之一，拼写规则和拉丁文相似，词根主要取自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不熟悉这些语言的人很难拼写世界语。世界语是一种人工创制的拼音化通用语言，而不是一种独立于不同语言的通用文本。

近些年来，有些欧洲学者也在考虑复活拉丁语，让拉丁语再次国际化，但是难度很大。反观汉字就能看出难度的根源。汉字是书写汉语母语者的文字，尽管不同区域的汉语母语者方言差异很大，汉字的超音规性质能够顺利书写各地方言。拉丁文已经不是书写母语的文字，尽管欧洲很多语言差异不是很大，但学习拉丁文等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因此难度很大。

莱布尼茨曾经意识到了拼音文字的局限，他希望建立一种“普遍的文字”，这种文字应该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就像数学符号系统。莱布尼茨没有意识到任何文字都要表音，但他的理想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基于超音规性质的汉字就近似他所说普遍文字。历史上，在没有专门学者和机构倡导的情况下，汉文曾经被东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作为通用书面语使用，说明汉字可以比较有效地充当国际书面语。

5. 汉字改革：着眼汉语国际化

和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学习难度大。汉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汉字难学的问题。但是文字改革过程中，汉字的超音规性和汉字共享的重要性没有被认真考虑过。唐朝人如果创造一

种崭新的拼音文字,在文化共享上就要遇到障碍。后生们很难看懂先哲的经典,必须有大批人把凝聚在汉字文献中的知识译成拼音文字。方言区的人不仅要学会拼音文字,还要学会京城的标准音。京城还要有一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语言学家来斧正文字。这种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个政府能够完成的。拼音文字有它的优势,它易于学习,但不利于维系华夏文明和汉字文化圈,不利于汉语国际化,不利于文本共享。当然,汉语拼音文字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它应该和汉字并行而不是取代汉字。汉语拼音应该是学习汉语和计算机处理汉语的有效辅助手段。19到20世纪初,卢懋章、王照等发起的切音字运动,主张以拼音辅助汉字教学,仍然是有意义的。

简化汉字也有利有弊。简化字的好处是笔画少,便于书写,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造字的理据,比如“邓、灯、凳”作为简化字似乎没有关联,但作为繁体字,“鄧、燈、凳”属于相同的声符系列。由于简化字理据不充分,中国港澳台地区继续用繁体字,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则使用简化字。这给共享汉字文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简化字也给中国大陆各大方言区的人阅读古代汉语文本和传承汉文化带来了困难。简化字的出现以及日本等地汉字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字的文势。计算机时代为对接简化字、繁体字以及日本、韩国等汉字,各种汉字字符集相继出现,由此可见汉字共享的重要性。

汉字系统的多样性导致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汉文本共享遇到困难,这是汉语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也是文字改革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的严重问题。要使文字得到充分的共享,保持统一至为重要。在简化汉字以前,文字变化主要集中在字体而不是字形,从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到行书等,主要是字体变化。古人长期不进行汉字字形改革,不一定是古人保守,古人也并非不了解拼音文字的创制机制。法显、玄奘等去印度取经,应该很熟悉梵文的拼音机制。维持汉字字形的统一,应该是古人的一个合理的选择。古人保持汉字统一的行为对汉字强大文势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也为汉字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汉字的超音规性质和强大的共享功能,为汉字提升文势,维系华夏文明和汉语国际化提供了书写纽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汉字的这种重要作用。将来的汉字改革,应该慎重考虑汉字的纽带作用。现在汉语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如英语,不是汉字的问题,而有其他原因,包括几百年来闭关自守,轻视科学,缺少自由竞争。汉字反而是汉语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汉字难学的问题,文字改革如何进行还需要做更多的思考。

6. 结语

梁启超、鲁迅等当初关注的是汉字学习的难易问题,对汉字的看法并没有涉及到汉字的纽带维系功能,因此没有看到汉字的共享功能。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人类百年之后会进入全球化网络时代,共享功能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作为书写纽带,汉字的文本共享作用是巨大的。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共享汉语文本,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共享汉语文本。汉字有超越拼音规则(超音规)的性质,可以训读,这是汉字维系功能和共享功能的基础。日语没有废除汉

字，有利于汉字文本的共享。实际上汉字文本至今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共享。汉字文本共享并不是汉文化扩张，而是有通用和互惠的价值。日语的大量词汇也可以丰富汉字文本，近代大量日语汉字词汇反馈到汉语中就是一个证据。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有大量的汉语借贷语素，如果除去这些汉语借贷语素，这些语言将无法运转，因为这些语言的演化过程就和汉字文本共享过程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如果需要国际通用文本，汉字文本应该是首选的国际通用文本之一。

通讯地址：10087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cbyhf@pku.edu.cn

体现外语学习观发展的日语教材编写要点浅析

——21世纪之后国内部分日语教材的梳理^{*}

北京师范大学 林洪

提 要: 本文梳理了中学日语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高校日语教学大纲与中学及部分高校日语教材关系;梳理了我国日语教学大纲中对外语学习观相关思路与途径的呈现,诸如关于“learn the language”和“learn about the language”、功能意念、语篇、跨文化、能力、最近发展区”和“i+1”、“支架”、“情境”、合作学习等;梳理了几部进入21世纪之后由我国教师团队编写的综合日语教材的基本结构,粗略观察了在呈现学习过程、为学生搭好支架、突出言语语用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分析了日语教材编写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再到新近提出的“学习为中心”的聚焦变化。

关键词: 日语教学大纲、21世纪的日语教材、学习观、学习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各国各阶段的教育均在不断地改善、改革之中。其中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不断加强对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关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外语教育,中国的日语教育亦然。当今世界外语学习以及外语教育的总体趋向是:外语是当今国民素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语学习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外语学习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过程、运用过程、体验过程,也是学习外语的目标之一;外语知识的学习是为运用外语服务的,知识本身不是目的。

针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社会上不乏不同的声音,改革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越来越关注学生为什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本文拟从外语学习观的角度,浅析日语教材的编写要点,简要梳理21世纪之后国内部分日语教材在关注学生学习方面的大致状况。

^{*} 本文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理論と実践——日本語の履修カリキュラムと日本語教材開発を中心として」(2016)的基础上筛选、补充而成。

1. 1972-2017年期间日语教学大纲与教材编写概观

本节将分中学与高校两个部分,简要地梳理1972-2017年期间教学大纲(含课程标准)与日语教材之间的关系。其中,高校日语教材以综合日语教材为例加以梳理。

1.1 中学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教材编写

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一般是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1986年出台的《全日制中学日语教学大纲》提出“语言是一种有结构法则的体系,因此要教给学生必要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基础知识”(张国强 1991: 45)。而1990出台的《全日制中学日语教学大纲(修订本)》指出“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学会必要的语法知识和规则的运用,通过严格的实践训练,获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听说读写方面具有初步运用能力,为继续学习日语打好基础。”(张国强 1991: 46)可见此时大纲的基本思路在于“双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上,此时的日语教材编写也基本是事先罗列好语法项目,然后再根据语法编写课文。真正从这种比较单一的语法编写大纲走出来的是1996-1999年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这是按照1996《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的要求,“把体现时代特点的活生生的语言材料、有助于理解及掌握日语的讲解及操练、社会文化背景介绍作为培养交际能力和巩固教学效果的三个支撑点,以此形成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尝试语言结构与功能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编制方法。”(唐磊、刘粉丽 2010)至此,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从语法大纲走向综合大纲。2001和2003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的《日语课程标准》先后出台,教学目标从“双基”走向“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即基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学习策略、跨文化素养和情感态度的同步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日语课程标准》编写的初中和高中两套教材,在努力体现《日语课程标准》提倡的理念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探索,在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国内日语教材中率先尝试以“用日语做事”为主线编写的教材,走在了国内日语教材编写的前列。

2014年底起,教育部启动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2018年1月16日已正式公布《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此次修订工作的最大变化是将此前的“三维目标”整合、提升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此基础上各学科提出各自的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是着眼于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终身发展各学科如何做出各自的贡献,强调实践活动。

关于中学日语教学大纲(含课程标准)与中学日语教材的关系,通过下表予以简单梳理。

表1 基础教育阶段日语教学大纲与教材的关系简表

年份	大纲	教材 ¹
1982	中学日语教学纲要	
1983.8-12		《初级中学课本日语》1-6册
1984.10-1985.3		《高级中学课本日语》1-3册
1986	全日制中学日语教学大纲	
1989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初审稿)	
1990	全日制中学日语教学大纲(修订本)	
1992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试用)	
1992.10-1994.10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日语》1-3册
1995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试用)第2版	
1996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	
1996.12-1998.12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1-3册
2000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	
2001	全日制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实验稿)	
2003	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实验)	
2003-2005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日语》(共6册)
2007-2009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日语》(共10册)
2012-2018	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 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义务教育教科书 日语》七年级全一册、 八年级全一册、九年级全一册

1.2 高校日语教学大纲与教材编写

自1972年起，诸多大学陆续开设了日语课程，教材建设也随之推进。1979年10月颁布的《日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对教学目标的表述是：外语院校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日语翻译、日语教师和其他日语工作者。初步掌握语言和文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准确熟练的听说读写译日语的技能，有较好的汉语基础知识和协作能力，初步掌握一种第二外国

1 表中所列教材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语——英语。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有健全的体魄。”在1978年之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日本的原版教材得以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語学校²编写的《日本語I、II、III》，后有《新编日语》和《新日本语》两个编译版。北京出版社1984年根据日本凡人社的《日本語初步》编译的《日语初步》在中国也有比较广泛的使用。1990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颁布，其教学目标定位于“使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掌握日语基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丰富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并使其了解日本概况，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此时，不少院校开始感到使用原版教材（包括编译版），课文的日语地道性有了保证，但如何更好地解决在中国学日语所面临的问题上仍有所不足。同时，随着功能意念、交际法等理论的引入，编写人员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语法为编写大纲的教材，不利于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2000年出台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修订）》将教学目标定为“引导学生扎实学习，掌握日语基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培养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丰富学生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同年出台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将教学目标定为“学生毕业时应具有扎实的日语基本功和较强的日语实践能力；还要具备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应能很快地适应除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以外的各种口译、笔译及与日本研究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由此，各高校和各出版社，更加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加关注学生日语运用能力的提高。

以下，简略梳理一下国内编写团队主导编写的综合日语教材。

表2 高等教育阶段教学大纲与部分教材的关系简表

年份	大纲	教材	编者	出版社
1973 - 1974		基础日语(理工科用)上、下	湖南大学外语教研室日语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4 - 1975		日语(日本语科用)1 - 4册	上海市大学日语教材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科技日语	汪大捷	商务印书馆
1978		日语	复旦大学日语教研组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 1979		日语(理工科用)(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周炎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医用日语基础	吉林医科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日语(第二外语用)	华南工学院等五院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2 JLCTUFS(Japanese Langua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身是1970年设置于东京都府中市住吉街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附属日语学校”。1986年4月合并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教育教材开发中心。”(<http://www.tufs.ac.jp:8080/common/jlc/about/index.html>)